

13
三

歷史與文化叢書

麥田出版

時間·歷史·敘事

【史學傳統與歷史理論再思】

Time, History and Narrative

Reconsidering the Tradition and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李紀祥

◎
著

「何入學時首先遭遇與首先遭遇與首先遭遇與探索的課題；也是歷史夜的反省與再思。 與再思。 與再思。」

回文學理論的探討迄今的探討迄今的探討迄今未輟。舉其犖犖大者如「思想史」，「卡耳史」，「卡耳史」，「卡耳史」，「卡耳史」，「卡耳史」，以及將史家比及將史家比及將史家比喻為譯者和敘事者的後三都是西方學者的看方學者的看方學者的看法。中國史學是否也有屬於自己的歷史哲學？

作者歷經多年的反思，在融貫中西史學理論後，從中國史學的角度重新詮釋「何謂歷史」、「歷史敘述」、「史書體制」等課題。本書對中國歷史學界的意義是，它從中國固有史學的觀點來構築一套屬於中國史學的理论架構。——姑不論您是否贊同本書作者的這番詮釋，一套史學理論架構的構築本身就值得被擊掌肯定。

ISBN 957-469-697-9



9 789574 696970

00350



RH5013

售價：350元

cité 城邦

麥田出版



盧建榮主編

歷史與文化叢書 13

時間 · 歷史 · 敘事

史學傳統與歷史理論再思

Time, History and Narrative
Reconsidering the Tradition and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李紀祥／著

麥田出版

歷史與文化叢書 13

時間・歷史・敘事——史學傳統與歷史理論再思
Time, History and Narrative: Reconsidering the Tradition and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作者 李紀祥

主編 盧建榮

責任編輯 陳毓婷

總經理 陳蕙慧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

電話：(02)2356-0933 傳真：(02)2351-9179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

網址：www.cite.com.tw

客服服務專線：(886)2-25007718；25007719

24 小時傳真專線：(886)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9:00~12:00；下午 13:0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35 號 3 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 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62833

E-mail: citecite@streamyx.com

印刷 宏玖國際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01 年 9 月 20 日

初版二刷 2006 年 11 月 15 日

售價 / 35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957-469-697-9

目 錄

- 004 孫序 孫康宜
- 009 自序
- 021 1 何謂歷史
「史學導論」之教學與提問
- 043 2 以「史」為學與以「歷史」為學
- 065 3 時間·歷史·敘事
可逆性、可斷性、轉述及其他
- 091 4 「言」與「文」
《史通·言語篇》中的歷史語言觀
- 109 5 趙氏孤兒的「史」與「劇」
文述與演述
- 151 6 劉知幾的史體論與備體觀
- 213 7 「編年」論述
時間之鏤刻
- 239 8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與「紀事本末體」
- 295 9 歷史與不朽
在時間中的「在」與「逝」

孫序

孫康宜

李紀祥教授告訴我，麥田出版社將再版他的大作《時間·歷史·敘事》一書。我能為他寫序，感到十分榮幸。

我第一次遇見紀祥是二〇〇〇年的一個八月天，地點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咖啡廳。那次我專門到台灣去開漢學會議，想順便認識一些新朋友，所以熊秉真教授特地把紀祥請來——那天老朋友王德威教授和王瓊玲博士等人也在場。記得，我們每個人都叫了一杯冰咖啡，就天南地北地聊起來了。我正巧坐在紀祥的身旁，就開門見山地問道：

「李教授，你平常除了教書以外，還有什麼嗜好？」

「啊」，他微笑道，似乎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我的嗜好就是咖啡和寫作……。」

他的回答頓時令我感到驚奇，因為我知道他是一個專攻歷史的傑出學者；在我印象中，一般的歷史學者都不會如此回答。然而，也正因為他這個不尋常的答覆，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發現，他的文學功力很深，頗有「文人」的氣質。在短短的兩個鐘

頭之內，我們從明末才子陳子龍談到吳梅村，再從清朝的文人袁枚談到龔自珍。我們同時也互相交換了個人讀書和寫作的心得和計畫，覺得許久以來已經沒碰過這樣有「趣」的學者了。

紀祥的「趣味」使我想起了晚明文人所提倡的風氣——那是一種「才」和「趣」融合在一起的非功利的人生品味。張潮就曾在他的《幽夢影》一書中說過：「才必兼乎趣而始化」。意思是說，一個人的才華一定要兼有率真的「趣味」才能達到「化」的高境界。

另一方面，我發現，紀祥對咖啡和寫作的愛好幾近於「癡」。我告訴他，這樣的偏好也很有晚明的特質，因為當時的文人相信，唯其有「癡」，一個人才有真性情。張岱曾說：「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其實那個「癖」字也是「癡」的意思。因此，我提醒紀祥，他既然對寫作有那麼大的興趣，就必須努力堅持下去。有很多人以為研究歷史就不能從事寫作，但我認為那是錯誤的想法。能用生動的筆調把歷史再現出來，並能寫得引人入勝，才是高明的歷史家，我特別舉出我的耶魯同事史景遷（Jonathan Spence）作為範例。

不久之後，我和紀祥成了筆友，也隨時交換寫作的成果。第二年春天我們又一同在加州史丹佛大學開過一次學術會議。散會後幾天，我就接到了他的來信：

「會議結束後，一個人在舊金山又留了三天，天天喝咖啡，看來往行人，寫行遠筆記；街邊也喝，陽光下更是不能少，晃到海邊，遙遙對著惡魔島、天使島，也不能不喝；喝了就可思可想可念，懶洋洋的筆下，隨著年紀，天空的藍也多層次起來……望

著天使島，竟不知不覺想起您文章中已表出的華人華工華史，中間已是多少映照……。」

後來紀祥轉往佛光大學執教，在學術上進了另一個階段。接著，他又來了一封信：

「今紀祥已至宜蘭，小朝在山，心可以遠，意可以收，可以望海，可以依山，可以細思量……於是知人之生命經歷，皆是文章筆下自返而原心之運動……。」

這些年來，我發現紀祥是我所認識的新一代歷史學者中比較富有文人氣息的人。我特別欣賞他把學問和生命融合在一起的態度。他曾說：「無論是那一門學問，如果與自家不貼切，也終是枉然」；「唯有生命的『躍出』自己，才能『呈示自己，才能在大化與時間的遷逝之流中，繼續領略文字與書寫。」此外，他在信中時常談到歷史形上學，也談到亞里斯多德的「詩學」；不但有議論，而且字裏行間總是充滿了詩意。我特別喜歡他這種富有「詩意」的人生觀——對他來說，詩即人生，人生即詩。但他絕不是一個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裏的人，他廣泛涉獵，充滿了好奇；而且對於所讀到的新理論和形象思維，總是設法用自己的語言再現出來。他有關這一方面的想法，有時流露在學術文章裏頭，有時流露在信件中。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我一向精讀海德格（Heidegger）、呂格爾（Paul Ricoeur）、托多洛夫（Todorov）、傅柯（Foucault）、高達美（Gadamer）、哈伯瑪斯（Habermas）等人的作品，總覺得這些理論大師的聲音有如磁鐵一般地吸引著我。現在看見新一代的歷史學者李紀祥居然能用一種富有詩意的語言把這些理論和生命銜接在一起，怎麼不令我感到興奮呢？

在紀祥著手撰寫《時間·歷史·敘事》這本書的那段期間，我有幸先看過其中的幾章，因而特別感到欣慰。我認為，他書中的章節，不管是內涵或形式都相當突出，為歷史的「書寫」寫下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其中他一個最大的成就就是把「歷史敘述」和「文學敘述」的關聯作出了深刻的探討，此外還把傳統意義上所謂史實之「真、假」進行了令人十分信服的「解構」。記得當初剛接到〈趙氏孤兒的「史」與「劇」〉那一章時，我就衷心佩服紀祥的功力，覺得那是重新檢視「歷史」定義的一篇難得的佳作。這篇文章主要在討論歷史上「趙氏孤兒」的故事之演變，全篇寫得十分生動而有趣。原來根據《左傳》的記載，這個故事本來只是有關趙氏家族由於私通亂離而產生的流血事件。一直到太史公司馬遷的筆下，該主題才漸漸涉及趙氏孤兒的復仇故事。但最後真正把焦點變成「趙氏孤兒」，而又開始關注女性角色趙莊姬者，卻是元代的劇作家紀君祥。可以說，「趙氏孤兒」的故事後來之所以在中國民間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實與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劇本不斷被搬上舞台一事息息相關。（請注意，這裏存在著一個有趣的巧合——李紀祥的名字與元代劇作家紀君祥頗為相似。）重要的是，紀祥在此利用了「趙氏孤兒」的故事演變來說明歷史「真相」的無法捕捉——事實上，任何敘述都是一種更動，一種新的解釋。即使作為第一個「文本」，《左傳》並不一定比《史記》來得更接近歷史真相。所以，其關鍵「並不是史實真假的問題，而是本事與新編的對待」。換言之，既然歷史都是由人一再敘述出來的，它已經無所謂真假了，歷史本來就充滿了某種「詩性」。

我認為紀祥的書中所處理的主題就是今日西方文學批評界裏最為關切的「representation」（再現）和「performance」（演述）的問題。本來，「再現」和「演述」既然都涉及到語言的敘述，它們就無可避免地會產生歧異和「漏洞」（gap）。據著名文學批評家米歇爾（W. J. T. Mitchell）所說，這種「漏洞」其實說穿了就是所謂的「文學」。

在這裏，我必須強調的是：紀祥一直所希望做到的，就是把這種充滿「漏洞」的文學敘述性推廣到歷史的研究領域中，而這也就是他撰寫這本《時間·歷史·敘事》的主要目的。有趣的是，這本書的緣起涉及到作者個人的一種「困惑」，一種對歷史研究本身的困惑。於是他就把書寫本書的經驗形容為一個「惑史的心路之旅」，他希望他的書能終究「貫穿其間之『惑』，撐開來說其所惑之世界。」

紀祥以「不惑」之年而能進行他的「惑史」之旅，也算是性情中人了。盼望讀者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也能以充滿情趣的心懷欣賞本書中的言外之旨。是為序。

2006年10月26日

寫於耶魯大學

自序

這本論集中的九篇文字，記錄著筆者十年來治學歷程之一端，主要集中在歷史與理論兩層。由〈何謂歷史〉始，以〈歷史與不朽〉終。隱約仍可看出一個主軸居於其間，筆者自名為「惑史之旅」。這種以「惑史」為軸的治史歷程，說來容易，但也實有機緣。照說人的知識成長本來就是以「疑」為始，以開開心心得「解」為終。但如果是先以「解」而始，設定了一種方法訓練，那麼，即便填塞了再多，也只是記誦之學。

無論是那一門學問，如果與自家不貼切，也終是枉然。對筆者而言，如果不是在華岡甫得博士便留校任教，擔任「史學導論」課程，因「導論」而迷途於「史學」的「林中路」，而致支唔，不能言、不能思，墜入林中茫茫的霧，恐怕至今都還在自以為是的一塊地基上，安然地以「方法」為「路標」，為切近「歷史」乃至「得到歷史」的不二之途；原來就算「歷史」換成了任何異文：“History”或“Historie”，也不能證明你已進入「歷史」！那麼，「歷史」應當如何貼切於自己而終於能展開一條眼前成學之途呢？筆者在教了一年的「導論」課之後，逐漸覺得「躲在講桌之後」，也是一個可以存在的世界，正是在那裡，對「何謂歷史」、「史學

是什麼」，產生了大有疑之惑問？如果講桌之前的口耳宣講及攤開在課堂之中文字呈現的講義——但靠著幾本書肆中方法、導論書剪輯而成，就能導論歷史、傳達學問、傳述「歷／史」的古註今義，那麼，著實是一個時代歷史學／史學的大悲哀了。誠如筆者在〈何謂歷史〉一文的結尾所言：在門檻外者輕聲一問中，已無立足之所！與其自欺欺人，不如從「躲在後面」中「走出」，承認自己確實原來在史學園地中，是一個門外漢、未了漢；尚未挑柴擔水，也尚未上山下山。如果自己都不能心安，又如何能在己、在人，「史」能是一個「自家貼切」後一番輪轉的「實存」呢！更何況書肆中的「史學」書，多是以「社會科學」之方法及意識移植而來，對與不對，筆者無由置喙，（這九篇文字中無一是論及社會科學的。）但筆者至少一種感覺，來自於雅不願一個好端端的人文世界，就此被「方法」方塊其間，書房內與書房外，也好端端地竟是兩個世界，尤其是長年在華岡晨起依山夕暮望海的世界中，更能體會圖書館的內與外，始終是一個共濡的場景。

當吾人起始便在視野中只能看到司馬遷的「如何蒐輯史料」時，又何嘗能想到〈太史公自序〉的作者自安排一場戲劇對話體——史公與壺遂，以及《昭明文選》中收錄的〈報任少卿書〉之「人間悽怛」，也是史學身世之一環呢！筆者對自己的不安雖還不至自貶，但對自己華岡史學系畢業的「史學」二字之身分，則確實敏感，既愧師門，也有負於據說是由陸王心學而轉手的浙東史學之一縷傳承。章學誠曾譽邵念魯之史文為五百年來浙東僅見，而邵念魯之史文之大者却是〈劉宗周傳〉、〈王門諸子傳〉、〈姚江書院傳〉與〈王陽明傳〉。史學從來未與「文章」分離，也未與「行

動意義」分離，在時間中綿延的事件，仍然還是有著「選人入傳」與「自承前人」的系譜觀與敘事聯結在其中；這樣的一種起源於自身所在的自覺，正是史學是為己之學的起點。於是，捫心既不能自安，「何謂歷史」就要重啓其「惑」，重啓其「思」之旅；而唯一的地基，就在自己腳下，在講台之後那一隅方寸的佇足之處！

在這十年的感史之思的歷程中，要感謝「人文講會」及「人文書會」的一些朋友，前者不僅讓我知天外，也知道學海乘舟，繫乎一心；後者則伴我共讀了許多喫苦的書。如無道上學侶，切磋磨砥，相互辨難，那些我認為奠下經典基礎的學力，是不可能長期迄今的週復一週積累的。今日回顧，早已分不清是「過去」還是「現在」的生命感受與回憶，在回憶裡，為了〈自序〉而調出的片斷情節，竟都因此聚攏，成了某一版本的小敘事、個人生命中的小故事，有人會認為這「回憶」就是私人性的「歷史」麼？

在切磋問學中，西方的文學批評及美學理論是不可少的聲音，自「講會」及「書會」的科際中冒出而貫通著，形成了主旋律，沒有人敢在自己的專業之外輕乎它的成色與銖兩。尤其是籌辦「重讀中文研討會」的那一年，「中文」與「重讀」對我們都構成了沉重的威脅，對於我們所使用於書寫的「母語」，已不敢再貿然與胡適的「白話文運動」再作出率爾的聯繫與歷史的承諾，「白話文」彷彿更加模糊；正因為這樣的茫然，疑惑又為我們重啓了一扇門，我的〈言與文〉之寫作背景資源實來自於這段經歷，也為爾後的「近代人文的形成」之小型座談會有了一番構思。我們更會因著某些閱讀與討論理論文本中的議題而藉題發揮，激辯在其中所瞥見的文、史之爭，文、哲之爭，詩、史之爭。「詩」的界限可否「清

楚地」標界，「歷史中的世界」或者「史傳」中的人物是否就是羅丹的塑像，是否就只能是一幅印象派畫作；赫塞（Hermann Hesse）筆下的人物典型重要，還是一場戰爭中的車馬之數重要？究竟有無「史傳」，在以「文」為「學」中的「文體」與「文類」之外？經由敘事而出的「情節」與「場景」，竟真能讓我們——讀者產生對古聖賢的景仰，英雄慷慨悲歌的崇拜？還是那只是一縷輕煙的情緒，是「文字」與「心理」聯繫的一種「意象」？歷史的知識論是如何構成的？起源於何處？詩的成分又是何來？歷史世界中的角色（活動）真就能呈現「古人當下人生」的「真」之精采與「俗」之實諦麼？還是只是經過「知識化」的「脈絡」之處理，生產了另一個世界，我們正困難地與它「聯結」，又懼怕在身後偷偷窺笑著的，正是「真理的洞穴」與「上帝」；一旦啓蒙可以「知識化」我們的世界，歷史主義與解構主義只好相繼說「不」！一旦進入了「時間」，一切已必然能稱之為「古」，因為已然是「今」。你只能「看」到一橫一豎符號的入目，這符號便是蹤跡，用力銘刻、濡墨、書寫的人所為何來，那一股驅動生命之源的？這一問，究竟是否還是支撐「何謂歷史」的形上學或認識論？

如果說十七、十八世紀是啓蒙時代哲學的世紀，而十九世紀是歷史主義啓動「存在即歷程」之歷史式思維的時代，則二十世紀以來，文學批評與理論顯然在這個時代中正開啓我們人文的視野，不時促使我們的反省具有深度。（這又如何呢！歷史學必定必須要有學科種族主義來保障自己，拒斥與認定文學中的思想性、創見性是一種「浪漫主義」的種族之邦，只能生活在湘水之畔唱歌的感性種族？）文學不再是自居於古典時代的「文學」，它可以

改稱為「哲學」。大衛·卡耳 (David Carr) 在《時間、敘事與歷史》(Time, Narrative, and History) 書中，回歸到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來平議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行動性」的不足，這是哲學論述，他用的是文學理論的章法。保羅·呂格爾 (Paul Ricoeur) 的《時間與敘事》(Time and Narrative) 更是回溯自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的《詩學》(Poetics) 起章，融合了奧古斯汀 (Aurelius Augustinus) 的「時間」再穿透至晚近的敘事學；托多洛夫 (Tzvetan Todorov) 《批評的批評》(Critique De La Critique) 中隱藏性地針對「海德格」，讓我們窺見了「文、哲之爭」的「歷史」，爭的正是解釋與呈現人類歷史穿透力度的有效與正統。或者說，過去的哲學章法還只是草稿的階段，必須要待文學時代的來臨，哲學才正式回歸正位；過去的歷史學也只是取得普通閱讀訓練的憑證，必須要到文學閱讀與書寫的階段，人類歷史的意義才真正在人生諸面向中得以展開真正的「寫史」。這不禁讓人想到宗教時代的創世紀說中有關人類意義的起源論述；以及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 區分「自然史」與「人類歷史」的寫作想法；中國的王船山所承襲的「三代史觀」，「孔子」居在人文的轉折點上，開啓了人類歷史，也正是這樣的一種意涵。人類歷史總是在回顧中找尋某個支撐起整個意義的支點，而意義的地基之找尋也總是以某個時代文體承載了書寫了義之責。

一種企圖進行歷史記憶重窺的建構，也早已悄悄展開，一切的歷史都是「文學史」，文學願意改稱「歷史」也無妨。在二十世紀以來，他們已是昂揚自信、遼闊澎湃深邃的一群。加諸於自己身上的，已不再只是限於「文學」，「文學」顯然已經發現了自己

對人類世界還可有更多的(或是過多的?)職責。如果人類歷史的知識心靈在西方已走至此,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去拒斥,然後說:十九世紀的歷史學系譜才是自我的身分認同,那也只不過是「歷史家族」的「族譜」版本之一支而已;學術的血緣豈是DNA的,傅柯(Michel Foucault)就能告訴我們這點,而單就這點,他那話語辨讀與考古系譜學的斷層觀看就足讓人眼下為之一亮,擊節稱道。歷史學不正以多種選擇及獨特的智慧共業來照亮世間為志,而自詡為掛在殿堂上的明燈明鏡麼! («鏡」與「燈」的思考及若干以此為書名者,在文、哲領域皆有。)還有什麼是「歷史學」冀望企及的大業,它與宗教、神學、哲學與文學,能有什麼不同!

如果歷史學的寫史大業就是文本流傳的身世,如果「寫史」就是「寫作」,那麼誠然一切的歷史皆為「文學史」,更精準地說,一切寫史皆為「文學」。如果一切「寫作」皆為「寫史」,那麼,又有什麼理由文學理論家與文學批評家以及他們所用以為文本者,不是「歷史」的另一版本。容裝「真相」的歷史舊瓶,已顯示出某種貧乏,我們應當深懼此點,「真相」一詞的狹隘使我們早已遺忘了坐懷母抱中起源話語的感覺,失落了何以在記憶中「逝水年華」特別令人滋味萬端?緊擁著「真相」,將「虛構」與「真實」對立起來,生怕離此一步便無「歷史」,又豈是「文史之爭」的真諦。我們正在這一代人類的舞台上攜手共促人之為文,人文因為合作而分工,而分工却未必儘是專業之底蘊。

如果「歷史學」已經遠離此,那是在「獨佔性」中遮掩著自身,也遮蓋了其他可能;如果亞里斯多德《詩學》中的「可能性」指的是「過去」與「未來」之遭遇會聚於「現在」之演出的話,

那麼任何「可能」總是「已然在」某種形式之中寓存著了。現在，文學的聲音不斷自理論與批評中冒出，我們必須聆聽其中的「歷史」，小心聽、側身聽，「歷史」的聲音與情懷正在耳目與心府中響起！我們必須再度學習，一個鎮日坐在案前、以學術為志業的人，他要怎樣才能經歷一種意義上的安坐與安住。太陽總是每日自東方地平線升起，「史權」並沒有使我們壯大，唯有生命的「躍出」自己，才能「呈示」自己，才能在大化與時間的遷逝之流中，繼續領悟文字與書寫。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努力闡述著一種不可能的零度／透明之書寫時，不正看來像是十七、十八世紀哲學認識論上針對「物自身」「萬物客體」如何「認識」之可能與不可能般，是一個二十世紀的文學再版。

當皮亞杰（Jean Piaget）與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都已相繼在「心理學」、「熱力學」的不同領域裡相繼處理了康德（Immanuel Kant）的問題時，歷史學界仍然捧著史學程序法則的書，泰然地奉著蘭克（Leopold Ranke）及其後學為師法，還不能意識到種種「知識」與「人文」的推進與反省已在身邊發生。從各個方面以它種語詞論述了我們的課題。「過去」是什麼？是一個客體？這個問題如在康德，則顯然是「不可知」的；更何況是從傅柯看來，由「過去」到「歷史」，中間尚有多少斷層被深埋；或者如某些學者所觸動的書寫之弦，「過去」與「歷史」之間，有的只是書寫，理論與文本似乎成了「文字」所能升起的煙嵐之最大滿足的歡愉境界（我說的不是 Derrida）。當我們盯著文字時，想的是什麼？做為一個使用漢文的閱讀者，首先映入的，是版本：明本、宋本，甚至是唐卷、漢牘？當「漢牘」與「明本」加上新式標點本一齊